

草創期的日藏漢籍舊鈔本研究

——以狩野直喜、羅振玉等五人為例

童 嶺

提 要：目前，“域外漢籍研究”在中國是一門方興未艾的朝陽事業。所謂域外“則指禹域（也就是中國）之外”（張伯偉先生語），日本所藏（簡稱日藏）漢籍舊鈔本是域外漢籍研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20世紀初期的中、日學者如楊守敬、狩野直喜等，都對這項事業作出了筚路藍縷的開闢性工作，通過分析他們的學術特徵，對今天的研究有極大的借鑒意義。同時，草創期中日學者的合作結晶——《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十集，也在國際漢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關鍵詞：域外漢籍；楊守敬；狩野直喜；《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

一、序說

孰（ko）知（vedā）其真（addhā）？孰（ka）窮其故（pravocat）？何所自生（kuta ājata）？何因而作（kuta visṛ̥stih）？

——饒宗頤先生譯《黎俱吠陀無無頌》^①

對於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化來說，就必須產生這樣的問題：它是應該繼續保持着以往的形態，還是需要接受外來文化中的思想和機制並用不同於以前的方法來解決它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德國】阿爾伯特·史懷哲^②

① 饒宗頤，《固庵文錄·儀體篇》（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18。

② 阿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著、常煊譯，《中國思想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105。

如同阿爾伯特·史懷哲所言，自從國門被堅船利炮打開之後，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僅是形而下的器物，更有形而上的思想。而東鄰日本，至少在東洋學的學術研究上，^③已經形成了不同於中國的、如史懷哲所謂的“思想與機制”。為此，本文的焦點將鎖定在近代中日兩國學者對於“漢籍舊鈔本”的研究方法與思想上。

“孰知其真？孰窮其故？”——具體來說，唐以前文學、學術的研究，歷代學者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資料的缺乏。正如南京大學周勛初先生所云：“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每歎研究資料不足”。^④清儒考證學興起後，雖然在經史子集四部範圍內做了大量的輯佚工作，成績斐然（如《玉函山房輯佚書》、《漢學堂經解》等），然而在唐以前的文史領域，依舊有很多問題限於文獻而無法展開。

當中國學者歎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同時，日本方面卻保存着大量的珍貴資料——漢籍舊鈔本。張之洞《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求善本》云善本之義有三，其三為“舊本，一舊刻，一舊鈔”^⑤。據東洋史學者大庭修博士的考證，先秦帝國敗於淝水之戰後，帶來北亞細亞世界格局的大動亂。這一動亂引發了五胡時代第一次大量文物、漢籍東渡日本的浪潮。^⑥在刻本時代尚未到來之前，大量漢籍以鈔本的形式流傳日本。^⑦

然而，遲至江戶時代的日本，對於漢籍舊鈔本的態度大多停留在古物賞玩上。促使日藏漢籍舊鈔本從賞玩進入正式學術研究的主要中日學者，下文將着重選取楊守敬、羅振玉、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五位來列舉他們的業績。並通過分析早期中日兩國學者的合力之作——《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來考察草創期的日藏漢籍舊鈔本研究。

③ 參拙作，〈那珂通世、林泰輔與清末民初的中國學界〉，文載《文史知識》5（2009）。

④ 周勛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308。

⑤ 張之洞，《書目答問二種》，收錢鍾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系列》（北京：三聯書店，1998）。

⑥ 大庭修，《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德太子から吉宗へ》（東京：研文出版，1997），25。

⑦ 張伯偉，《東亞漢籍研究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及拙作，〈公元九世紀前漢籍東傳叢考〉，（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編），《日本學研究》19（2009）。

二、中國早期的漢籍舊鈔本研究

(一) 楊守敬 (1839~1915)

楊守敬，字惺吾，號鄰蘇，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陸城鎮人。楊守敬自幼工於學，尤以史地學著稱。其著《漢書地理志校補》、《隋書地理志考證》、《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以及鈔補《太平寰宇記》，被學者廣為讚歎。羅振玉曾經把段王二氏之小學、李善蘭之算學以及楊守敬之史地學合稱為“清學三絕”^⑧。楊守敬及門人熊會貞前後歷時數十年，所成《水經注疏》一書。汪辟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一文有云：“有清一代，以沿革地理著稱者：清初則山陽閻百詩，常熟黃子鴻；晚清則鄰蘇。”^⑨

楊守敬為中國學術留下的另一個巨大貢獻乃其東瀛訪書之舉。光緒六年（1880年），楊守敬受清廷駐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請，作為“英語通譯”的身份攜眷赴日。工作之餘，在東京等地多方訪書。資金不足時，就用自己所攜帶的六朝碑版與古玩與日本藏書家交換。^⑩同時結交日本漢學家如：森立之、島田重禮等人。此後一任駐日公使黎庶昌亦是文人雅士，在黎庶昌的大力幫助下，楊守敬開始督印《古逸叢書》，此中雖然以宋本古籍為主，然尚有日藏漢籍舊鈔本若干種，如《覆舊鈔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影舊鈔卷子本珊瑚集》、《影舊鈔卷子本碣石調幽蘭》、《影舊鈔卷子本天臺山記》、《影唐寫本漢書食貨志》、《影舊鈔卷子本原本玉篇零本》、《仿唐

^⑧ 參《鄰蘇老人年譜》1905年六十七歲之記錄，其云：“上虞羅氏蘊（振玉）得吾書，歎賞之。謂吾地理之學與王懷祖（念孫）、段若膺（玉裁）之小學，李任叔（善蘭）之算學，為本朝三絕學”。文載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一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23。

^⑨ 汪辟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文附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複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下冊），3458。關於楊守敬·熊會貞二人史地學的總體評介，還可參汪辟疆，《楊守敬熊會貞傳》，文載《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1—116。

^⑩ 日本學界當時正好開始興盛六朝書風，日本收藏家對於楊守敬的大朝碑版表示了極大之興趣。中村不折著、李德範譯，《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一書有云：“明治初始，提倡六朝書法”。（北京：中華書局，2003），2。楊守敬本人的書學思想，略可見於其著《學書遺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石經體寫本急就章》、《影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影舊鈔卷子本文館詞林》、《影舊鈔卷子本日本國見在書目》等等。楊守敬之前的東渡學者如黃遵憲、康有為雖然也注意到了日藏漢籍，然楊守敬以一人之力至此巨舉，確實震驚了當時中日兩國之學界。楊守敬晚年回憶此事，對岡千仞說：“余官貴國四年，無涓滴補國。唯為黎公網羅古書，刻《古逸叢書》二十六種，購得隋唐逸書百餘篋。此外，參考古書撰《日本訪書志》二十卷，此皆宋元諸儒所未夢見，故雖囊橐索然不少悔。”^⑩楊守敬影印品中除廣為流傳的《古逸叢書》外，尚有《留真譜》一書，^⑪此中皆日藏漢籍珍本之書影。楊守敬有關日藏漢籍舊鈔本另一功績在《日本訪書志》一書中。^⑫此書均為楊守敬訪得古籍之題跋，考訂群書，推源溯流，含有極高之學術價值。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以為有清至近代第一流之目錄學書，唯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曾之《開卷有益齋讀書志》、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和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四家而已。^⑬

1884年楊守敬回國時，攜有近20萬卷珍本古籍。對於楊守敬日本訪書的這些巨大成就，日本學者一直有說不出羨慕與懊惱。長澤規矩也《日本書志學研究史》中抓住楊守敬購讀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一事不放，說楊守敬：“受到遺老森立之的指導而精通書志學”^⑯。對楊守敬一直存有“報復”心理的當屬漢學家島田翰。當日本岩崎財團以極低價格全部吃進歸安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約20萬卷，建立靜嘉堂文庫時，島田翰為之作《皕宋樓藏書源流考》，提及楊守敬日本訪書之事，以為岩崎財團此舉方報多年前楊守敬日本購書一箭之仇。^⑰案，島田翰言語之間雖盛氣凌人，然亦可反見楊守敬當年訪舊鈔本之巨大成就，以及其對於東瀛學者之莫大刺激。

^⑩ 岡千仞，《觀光紀遊》。文載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五帙第四冊，光緒三年南清河王氏鉛印，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本。

^⑪ 目前較易見本為北京圖書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

^⑫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日本訪書志補》（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⑬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載《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二，75。

^⑯ 長澤規矩也著、童嶺譯註，《日本書志學研究史》，文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5（2009）：206。

^⑰ 島田翰《皕宋樓源流考》云：“昔遵義黎尊齋駐節我邦，與宜都楊君惺吾購求古書，一時為之都市一空。數窮必復，陸氏之書，雖缺其四庫附存本、道藏及明季野乘，不無遺憾。而予知今之所獲，倍蓰於昔日所失也。然則此舉也，雖曰於國有光可矣。”（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37。

(二) 羅振玉 (1866~1940)

羅振玉，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又號貞松老人。祖籍浙江省上虞縣，客籍江蘇省淮安縣。世人對於羅振玉的學術能力常常有懷疑，如以為羅振玉論學文字多出於王國維之手。張舜徽讀其《眼學偶得》、《存拙齋劄疏》等書，嘆服無比，以為《殷墟書契考釋》必出羅手無疑。傅斯年讀羅振玉《五史斠議》亦以為羅氏六朝史學世人罕敵。張舜徽總結羅振玉學術成就時，舉出六端：一曰殷墟甲骨文字的整理；二曰金石刻辭的整理；三曰古器物學的研究；四曰熹平石經殘字和漢晉木簡的整理；五曰敦煌石室佚書和高昌文物的整理；六曰內閣大庫檔案的保存和整理。^⑦張舜徽所謂六端之外，羅振玉有關日藏漢籍舊鈔本的整理和研究，亦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羅振玉的學術生涯大致可以分為赴日前與赴日後。有關日藏漢籍舊鈔本的學術活動，主要為在其赴日之後。

羅振玉在日藏漢籍舊鈔本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如下三方面。其一、搜集與影印出版。在敦煌古籍舊鈔本上，羅振玉曾經影印出版過《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正續編）^⑧。與此對應，在赴日後，羅振玉與日本當時第一流的文人學者建立了學術聯繫，將搜集到的日藏漢籍舊鈔本影印出版，如上揭《吉石盦叢書》。特別重要者，亦單本影印，如上揭早稻田大學藏《禮記喪服小記子本疏義》。其二、高水準的解題跋文。羅振玉幾乎在每種影印的舊鈔本前皆附有高水準學術價值的題跋，如《日本古寫本商書殘卷跋》、《日本古寫本毛詩單疏殘卷跋》、《六朝寫本禮記子本疏義殘卷跋》、《古寫本玉篇殘卷跋》、《日本古寫本史記殘卷跋》、《日本舊鈔秘府略殘卷跋》。這些題跋後匯集成《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出版，王國維《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序》云：“國家與群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費，以巨萬計。家無旬月之畜，而先生安之。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

^⑦ 張舜徽，《考古學者羅振玉對整理文化遺產的貢獻》，文載《中國史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⑧ 羅振玉編纂，《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4）。《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正續編），《羅雪堂先生全集》，（臺灣大通書局，1970），三編第八冊。

之。”^⑯其三、啟迪中日學者。常人所言，謂羅振玉發現王國維為大可造之才並提攜之為不朽之舉，其實羅振玉東渡後對於日本漢學界之刺激與幫助，其功亦不可磨滅。榮新江教授曾謂，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日本第一代敦煌學研究者，其獲得敦煌秘笈資訊的渠道，主要來自羅振玉。^⑰而對於他們本國內漢籍舊鈔本的價值，倘若沒有羅振玉的多方啟示，可能這些漢籍舊鈔本還要“沉睡”更久。而日藏漢籍舊鈔本學術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十集，若無羅振玉之助，欲出版面世亦為遙遙不可及之事矣（此事詳下論）。

與羅振玉同時赴日的王國維，亦在日藏漢籍舊鈔本上輔助羅振玉，作出了大量優異的研究。比如收載於《觀堂集林》卷二十一《史林十三》中即有不少唐鈔本之題跋。^⑱然而總體來說，東渡後的王國維對於日藏漢籍舊鈔本投入的精力可能不如羅振玉之多。^⑲

三、日本早期的漢籍舊鈔本研究

(一) 內藤湖南(1866~1934)與狩野直喜(1868~1947)

日本近代漢學史上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京都學派^⑳。其中東洋史學科第一代學人內藤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別號黑頭尊者）以及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科第一代學人狩野直喜（字子溫，號君山，別號半農人），礪波護《京大東洋學の百年》說他們兩位是“一同被視為京都支那學的開祖”^㉑。筆者

^⑯ 羅振玉，《羅振玉校刊群書敘錄》（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4—5。

^⑰ 榮新江，〈狩野直喜與王國維——早期敦煌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文載《敦煌學輯刊》2（2003）。

^⑱ 王國維，《觀堂集林》，《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本，1983）。

^⑲ 王國維東渡四年的學術活動，陳鴻祥總結為三：第一、幫助羅振玉整理大雲書庫之古文字與古器物；第二、溫經；第三、參與《殷墟書契考釋》的書稿編寫。參陳鴻祥，《王國維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十二章《居東四年的學術豐收》。

^㉑ “京都學派”這一概念，原本是指以西田幾多郎為代表的京都大學哲學研究者們，後來也延伸到指稱在中國文學、東洋史學等領域獨樹一幟的其他日本學者群體。關於“京都學派”這一概念的形成，請參如下著作：藤田正勝編，《京都學派の哲學》（京都：昭和堂，2001）；角田文衛編，《考古學京都學派》（雄山閣出版，1994）；張寶三，《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臺北：里仁書局，1998）；及拙作，《漢唐經學傳統與日本京都學派戲曲研究芻議》，文載《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2009）。

^㉒ 矶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62。

以為，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兩位在研究日藏漢籍舊鈔本方面均有許多共同點，故而在此一併表出。

上文所及，楊守敬、羅振玉、王國維等晚清民國第一流中國學者陸續東渡日本後，給予了日本學界以絕大刺激。青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一書中承認：“由於羅振玉、王國維帶來日本的考古學研究、民族學研究，給內藤湖南的學問打開了一扇大窗子”。[◎]其中羅、王對於日藏漢籍舊鈔本的研究同樣給予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學派學者開啟了一扇新的學術之窗。作為羅、王、內藤的後輩，神田喜一郎說：“羅王的到來，確實促進了（京都）學派的成長速度。”[◎]良有以也。

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一集）[◎]中收有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之學術傳記。總體看來，兩人均在各自的東洋史學、中國文學領域起到了承前繼後的作用：一方面繼承了清代考據學與江戶漢學，一方面又可以採用歐美式學術方法處理中國學問。在日藏漢籍舊鈔本的研究上亦可謂守先待後。首先，兩人的文集中有大量漢文寫作的舊鈔本題跋。如內藤湖南的《古文尚書卷第六跋》、《古文尚書卷第三·五·十二跋》、《禮記正義卷第五跋》、《春秋經傳集解卷第二跋》、《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跋》、《王勃集卷第二十九跋》[◎]等等。狩野直喜漢文題跋如《舊鈔本毛詩殘卷跋》、《舊鈔本經典釋文校記序》、《舊鈔本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殘卷跋》、《舊鈔本老子河上公注跋》、《唐鈔本文選殘卷跋》[◎]等等。狩野直喜甚至出版過全漢文寫作的《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足見其漢文修養之高。

其次，作為接受過歐美學術訓練的京都學派第一代學人內藤湖南、狩野直喜，他們在與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伯希和（Paul Pelliot）

[◎] 青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東京：中公文庫，1980），第四章，228。

[◎] 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等譯，《敦煌學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43。

[◎] 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一集）（大修館書店，1992），95。

[◎] 內藤湖南的漢文題跋基本收載於《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築摩書房，1971），第十四卷。

[◎] 狩野直喜的漢文題跋基本收載於：狩野直喜著，狩野直禎、吉川幸次郎校字，《君山文》卷三，1959年自印，京都大學文學部書庫藏本。

[◎] 狩野直喜，《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東京：東方文化學院，1932）。

ot 1878～1945）、沙曉（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等歐洲學者的學術交往中，也掌握了歐洲現代論文的寫作方式。因此，內藤湖南、狩野直喜也有不少用日文寫作的涉及漢籍舊鈔本的現代學術論文。如內藤湖南的《富岡氏藏唐鈔王勃集殘卷》、《舊鈔本翰苑に就きて》、《正倉院尊藏二舊鈔本に就きて》等論文。^①狩野直喜這類論文如《唐鈔古本尙書釋文考》^②、《奈良時代鈔本周易疏及經典釋文考》、《老子河上公》^③等。而後一種論文對於此後日本的漢學界產生的影響更大。同時也代表了日本有關日藏漢籍舊鈔本研究的一種新的發展方向。作為狩野直喜得意門生的岡井慎吾，就對日藏《玉篇》舊鈔本作出過大量研究，有專著《玉篇の研究》。^④

（二）神田喜一郎（1899～1984）

神田喜一郎，號鬯盦，出身於京都一著名之商家。雖然是商人之家，可是如同中國古代的儒商家族一樣，神田家也是極好漢文化的世家。祖父神田香岩的漢學造詣就頗高，在祖父去世第二年（1919年），神田家族影印出版的《容安軒舊書四種》就可以看出神田氏對於日藏漢籍舊鈔本的鑒定力之深。大約是源於家族關係，尚為高中生的神田喜一郎就有機會常常拜見東渡日本的董康、羅振玉、王國維，接受他們的耳提面命，這對神田喜一郎日後形成濃厚的舊鈔本意識有極大之影響。^⑤後來神田喜一郎自己在《董授經先生》一文中回憶：“那時我是中學生，記錄在管理家中藏書借出還回是我的任務，所以我一直陪伴左右，看着董先生與我祖父筆談”。^⑥入大學後，正值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執教時代，神田喜一郎可謂同時傳承了中日草創期舊鈔本研究巨匠的學問特色。

在神田喜一郎已經出版的書籍中，除了有如《敦煌祕籍留真》、《敦煌本李嶠百詠について》等關於西域的漢籍舊鈔本著作外，尚有大量關於日藏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的研究論文，如《舊鈔卷子本晉書殘卷解說》、《舊鈔

^① 內藤湖南有關日藏漢籍舊鈔本的日文論文基本收載於《內藤湖南全集》第七卷。

^② 上舉兩篇論文收載於狩野直喜，《支那學文叢》（增補版）（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③ 文載狩野直喜，《讀書叢餘》（東京：みすず書房，1980）。

^④ 岡井慎吾，《玉篇の研究》（東洋文庫論叢第19種），1969年再版。

^⑤ 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第二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4），224。

^⑥ 上揭本《敦煌學五十年》，119—120。

本文館詞林解說》等等，後大多收錄於其著《舊鈔本叢說》^⑦中。

神田喜一郎“解說”舊鈔本的方式並非舊來藏書家那樣，單單只記錄書的行款如何，幾經轉手等等。而是含有大量現代學術的考證與研究，如《舊



鈔卷子本晉書殘卷解說》一文中詳細考究了《晉書》出現的意義，以及當時的日本為何會遣人求此書等等。這些研究方法充份體現了一個成熟期東洋學者的特徵，鑑於他在稀觀刻本以及漢籍舊鈔本上作出的優秀研究，神田喜一郎於1959年獲得法蘭西學士院“漢學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此外，在世界漢學界書法研究中頗為重要的平凡社出版之《書道全集》二十八卷，其中中國部分的解說亦大多由神田喜一郎擔任參與。其主筆的涉及舊鈔本部分的解說也為書法家、文獻學者所推崇。

吉川幸次郎《神田博士還曆紀念書志學論集序》云：“夫藏書者未必學問，學問者未必藏書。是以惠施辨給，書乃五車。劉向傳經，事專中秘。宋元而降，載籍彌弘。合則兩傷，離之為美。不爾者，其惟虞山蒙叟乎。”^⑧ 神田喜一郎在漢籍舊鈔本方面，將藏書、鑒賞與研究較好的結合了起來，形成了此後京都學派的獨特舊鈔本研究風格。

四、兩國學者的合作與《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的誕生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十集之影印發行，可謂近代日藏漢籍舊鈔本研究事業上里程碑之舉。此舊鈔本十集之面世與上述中日諸賢皆有關係，亦可謂兩國漢籍舊鈔本第一代研究學者之合作成果。具體來說，1919年（日本大正八年）之時，羅振玉計劃從日本回國。由於羅振玉自己搜集、

^⑦ 神田喜一郎，《舊鈔本叢說》，《神田喜一郎全集》（東京：同朋舍，1984），第三卷。

^⑧ 文載吉川幸次郎，《箋杜室集》（東京：研文出版，1981），45。

影印日藏漢籍舊鈔本的事業尙剛剛起步，不忍廢輟，故囑託日本友人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將自己在京都的住宅變賣，並用其售房所得，全部捐贈京都大學影印漢籍舊鈔本。

狩野直喜《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跋》有云：

明治辛亥，清廷板蕩，干戈搶攘。我友羅君叔言攜眷東渡，築室京都東山下。閒居無事，乃得大展力於學。其所述作，足以傳後世。君又憾往年黎尊齋刻《古逸叢書》概收宋元舊集，而不及唐鈔本，掛漏猶多。借得古刹世家之藏，景印《尚書》《史記》《文選》數種，其嘉惠學者，功不在尊齊下也。大正己未，君將回國，悲其業中廢，托炳卿博士暨余鬻其田宅，舉所獲捐於京都大學，充印書資，大學因有景印古書之舉。此其第一集也。茲記緣起且附載君書於後，以見其高義亮節，卓越時俗，而稽古樂善之志，窮而不少衰，尤可敬重云。大正辛酉之月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狩野直喜記。^⑨

從中可知，羅振玉首先不滿《古逸叢書》“不及唐鈔本”——收載日藏六朝隋唐舊鈔本不全。^⑩其次，對於自己未完的事業感到悲傷，故而囑咐東友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全權操辦此事。在狩野直喜《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跋》後，尚收載了一封羅振玉致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的信札，羅氏存古之心，昭然可見：

湖南、子溫先生有道：連得拜教，快何可言。惟離索之感在眉睫間，可為憾耳。茲有請者，弟去國以來，萬念灰冷，惟傳古之志尚未盡衰。頻年略刊古籍，力不逮意，十才一、二而已。平昔嘗歎敝國黎尊齋先生在責國刻《古逸叢書》，但收宋元而不及唐鈔，至為可憾。竊不自量，欲身任之。而匆匆歸國，此願莫償。念有寓居可售，以充印書之資，欲鬻宅得款，捐入貴國文科大學，即以此資煩諸先生印唐鈔古籍，而戒行有期，鬻宅一事，非旦夕可就，擬即將此宅奉煩兩先生代覓受

^⑨ 跋文載《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1922年影印本。又上揭本載《君山文》卷三。

^⑩ 其實《古逸叢書》中也影印了舊鈔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原本玉篇零本》、《玉燭寶典》、《文館詞林》、《漢書食貨志》、《珊瑚集》、《碣石調幽蘭》等六朝隋唐漢籍數種，羅振玉所謂“不及唐鈔本”，乃屬私人信函中的誇大其詞。

^⑭ 《算學教書、算學教註》，《文史通義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94），上冊，154—155。
^⑮ 《借光筆上課本：吳昌碩國大文學藝術傳記稿》，《第一集》。

百年後亦頗為感入。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下》謂：“世之言學者，不知持圓與方，而惟知
圓與圓。②羅振玉正是百年少有的“持圓與方”之大學者。由羅振玉考得
數面影印的舊稿本事蹟，從1922年（大正十一年）開始，一直到1942年（昭
和十七年）为止，在京都大學以“總裁、校長”的形式，共陸續出版了10集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稿本》，目次如下：

《毛詩唐風箇箙》。毛詩索風正箇箙卷，《1922年影印（京都帝國大
學文學部影印舊稿本：第1集第1種）

《鴻臚》。鴻臚卷，存卷30（張楚金撰；龔公叢注），1922年影印（京
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影印舊稿本：第1集第2種）

《王効集》，殘2卷，原有卷29至30，1922年影印（京都帝國大學文
學部影印舊稿本：第1集第2種）

羅振玉回國後，因為想起參贊的圖內侍局與東亞圖書，有些計劃沒有實現（如圖中考古之選），或重新編成之（如撰《徐復觀先生年譜》）。這其中得以順利實現的，乃“欲圖名得教，捐入貢圖文科大學，即以此資獎勵先生印唐錄古籍”之事。海波算里，每一念及此中日兩國學者之尊崇存古之舉，

王，所得之情，悉數指人貴大學充印書之用。書成，除頌送各國書館，外，售價所入，以為持鏡之用。墨函之志，惟諸君贊成之。完契今小兒
面呈，弟行後亟乞賜錄收，無任懇請。弟此次返國，今兒事發喜難於準
治。若相剗自給，擬修繕臥室、吳中徐俟齋二先生同。敝園近年以
來，弗耽樂行，道德文章，掃地盡矣。今不尚廉頤立憲計，恐人道則致
於齷齪，故思表章一二先哲，以示模楷。唯志大力微，獨可憐歟。然精
勤之志，不能自己也。決易之間，可以卜焉。乃先帝園處之所在，且密
邇園浴，暇日可為考古之遊。而二三同志在京師者，時得過從，異日即
理骨肉，地僻俗淳，日用至簡，即享林先生之間中也。貢諸君子之間
國，或尚不為嫌者乎。意之所存，口不能宣。特借指墨，俾其函
函。此情道实，惟照不宣。弟謹報玉再拜，五月二十日。⑯

學部景印舊鈔本：第1集第3種）

《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殘卷，1935影印（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2集第1種）

《經典釋文》殘卷，1935影印（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2集第2種）

《漢書楊雄傳》殘卷，1935影印（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2集第3種）

《文選集注》殘卷，1935至1942影印，（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3—9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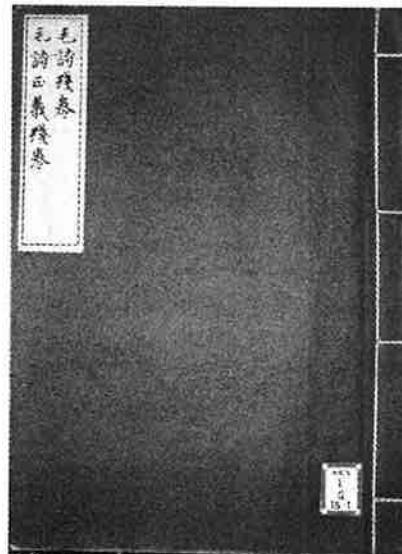
《尚書》殘卷，1942.6影印（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10集第1種）

《毛詩二南》殘卷，1942.6影印（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10集第2種）

值得一提的是，20年間，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不僅利用羅振玉留下的資金與線索影印出版日藏六朝隋唐舊鈔本，而且也幾乎在每種舊鈔本前寫有高水準的學術題跋。

如第一集第一種《毛詩唐風殘卷》，
狩野直喜在影印件前有跋文云：

右舊鈔本《毛詩·國風·蟋蟀》至《鵲羽》凡一百十三行，字體雅道，其為奈良鈔本無疑。今校以唐石經、宋小字本、相臺本，異同甚多，不遑枚舉。與《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相勘，亦有合有不合。今不縷載，試發數端。《揚之水》：“白石皓皓”，此作“皓皓”，《毛傳》亦同。案唐石經初刻作“皓”，後改磨作“皓”，宋以後則無一作“皓”者，不知《說文》所錄，從日不從白。《廣韻》三十二皓亦作“皓”。顧廣圻因謂《說文》當亦是“皓”



釋文，此處乃筆者據兩本折中而錄。

◎ 上冊本《京師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稿本》第一集。案，此段文字收錄《書山文》卷三，文字略有

“民”字缺筆可據也。以檢天水以復漢本，其隸庭始不可指數。今事均斷續，吾友寄圖書據先生所藏。字跡既秀，唐寫本之佳者。不惟《毛詩秦風正箋》殘卷，存《小戎》、《蒹葭》凡六十七行。前後

影印併發，有釋振玉的考證性跋文：

同收在《京師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稿本第一集》之《毛詩秦風正箋》

跋，這些研究性文字對於闡釋日漸演進舊稿本價值，起到了典範作用。的異同，並且在第一次校文後，又寫比較了張敦復石室本《毛詩》差異的第二條。這對研究注疏的角廈，考證了唐抄本與唐石室本、宋刻本及《毛氏子考文》本

不可沒，蓋是仍唐人抄本，雖亦未以復到本真莫矣。直喜又記。^④道書本書體拙陋，篇章繁縝，能參互見，年代亦稍後於此書，而是唐書《：「斥堠取者」無「堠」字，兩書正同。可見唐時抄本往往如此。集》，《毛傳》：「扶，扶也」作「扶，扶末也。」《鴻臚》，《羊國風國晉賦》，誤取對校。若《鴻臚》釋文「遞送」作「解說」；《羊子已誤此書，思較復石室遺書中亦有《毛詩》殘卷（原本今藏巴黎

喜人目者固別而論焉。特列直喜。

又為錄考語，以明此本之可貴，在其發揮經義，未得與夫歸繢珠玉，僅院，今歸東京和田氏。頃者，借得影印數部，以備內外學者。及還之，不如此本之佳，當推于歲古香，善美藝圓已哉！此本舊藏山城鴻濤帶樂之藏，其質考鏡，裨益學術，世所共知。然以此相比較，是知互見，而竟各本著也。（中略）夫隋唐古經傳之有於我者，固為不少。即若足利據，即《釋文》所謂一本，授受淵源，其可考見。凡此三條，經文之不詳。」案《釋文》：「蓋，本作𡇗，又作𡇗，求答反。」乃如此本所追。」陳亮正與之合。《林林》：「《說文》無𡇗字，避諱當依《釋文》作𡇗。」追又作𡇗。」陳亮云：「《說文》亦同。案《釋文》：「𡇗，本亦作𡇗。」此作「解說」，《毛傳》亦同。案《釋文》：「𡇗，本作𡇗，求答反。」是此本一出，足以證真說之正。《鴻臚》：「今少何少，見此避

其要者十事。《小戎》箋：“僕淺”至“淀伐”，《正義》：“金厚則重，知宜淺也。”“宜”，宋以來諸本作“其”，考其文誼，殆謂金厚則重，故知宜以淺薄之金為之，今本作“知其淺”，語意全失矣。（中略）惟此卷有之，得據以補諸本之缺。此卷雖僅存數十行，而所得益，乃如此之巨。雖亦多訛奪，此六朝唐人寫本之常，不足為此卷病也。富岡君搨先生博雅富收藏，精鑒別，今將玻璃版精印以廣其傳，屬為跋尾。予謹著此卷之佳勝，與君搨好古而不自私足以型當世者於卷尾。時宣統癸丑十一月上虞羅振玉書於東山寓舍之馨室。^④

宣統癸丑十一月，即1913年冬。可知羅振玉此跋文乃作於囑託內藤湖南、狩野直喜二人影印舊鈔本前九年也。益知羅振玉“傳古之志”既久且堅。此外，如史部的《翰苑》殘卷、《漢書·揚雄傳》殘卷也是唐人瑰寶，又如《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三至第九集的《文選集注》，亦是探索六朝隋唐人學習《文選》實態之佳本。

由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的導夫先路，影印和研究舊鈔本的風氣在日本關東、關西地區迅速形成。如“古典保存會”也開始大量影印日本奈良、平安鈔本以及中國六朝隋唐舊鈔本。^⑤又如1928年，狩野直喜滿六十歲，自京都大學退休之時，友人及門生為其出版了《狩野直喜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稱觴集》，以及影印《禮記正義》單疏本殘卷出版。皆是承接羅振玉傳古之志也。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云：“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起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訛，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流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昆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鄆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

^④ 上揭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案，此跋文後又收錄《羅振玉校刊群書敘錄》卷下，文字略有增改，此處亦筆者據兩本折中而錄。

^⑤ 山田孝雄為這些舊鈔本寫有題跋，收載於其著《典籍說稿》（東京：西東書房，1934）。

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⑯可知有清以來，搜羅古籍者，或藏而不讀，或但記撰人年代，未窺古意而流入收藏賞鑒之派者，比比皆是。以此視羅振玉、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中日學者合力之舉《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後者可謂功德大焉。

本文版圖來源說明

- 1、狩野直喜題簽、鈴木虎雄藏書印，“容安軒舊書四種”封頁，京都神田喜左衛門家印本，1919年版。
- 2、“毛詩·毛詩正義殘卷”，《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1922年影印本。

(童嶺 南京 南京大學文學院)

^⑯ 洪亮吉著、陳遵冬校點，《北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卷三·46。